



## 日本经济复苏和东亚合作

复旦大学 樊勇明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特征和结构性保证以及经济复苏对其东亚战略的影响。日本经济复苏强劲，表现出三个新的结构性特征。日本经济复苏能够持续，因为主要有三个结构性保证。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其东亚战略将会日趋活跃，其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劲头也将随之上升。

关键词：经济复苏 结构性特征 结构性保证 东亚合作

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各项指标出现持续的好转，一向对日本经济不太看好的各方媒体对日本经济的看法也趋向积极，认为日本经济已走出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十年徘徊”，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2004年8月17日日本内阁府发表报告认为，日本经济已连续29个月处于上升之中，出现了自二战以来的第六个景气高潮。[1] 主要民间研究机构8月份发表的预测显示，2004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将达3.77%，2005年度也将保持在1.91%以上的增长。[2] 国际权威机构对日本经济持有更乐观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月11日发表报告，把其对日本经济2004年度和2005年度的增长预测从原来的3.4%和1.9%分别上调至4.5%和2.5%。[3]

尽管2004年第二季度有个别经济指数有所下滑，但是这并未影响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日本经济财政金融担当大臣竹中平藏8月22日的电视访谈中说：“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循环中的增长周期一般为30个月，但我们现在仍期望第31和32个月的扩张”。他表示，第二季度只是一个暂停，日本经济仍处于稳定的复苏之中。[4]

日本经济曾在1994年和1996年出现两次好转迹象，但不久就夭折了。这次人们所关切的是日本经济复苏能否持续，日本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出现根本性转变，以及国内经济好转会给予其对外战略，特别是各国所瞩目的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什么影响等。

### 一 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特征

大量资料有力地表明，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日本经济的一轮增长已是不可逆转之势，这是因为同以往相比，日本经济出现了以下三个新的结构性特征。

#### 1. 民间需求推动型的良性经济循环已经形成。

所谓民间需求推动型，是相对迄今为止的公共投资拉动型而言的。众所周知，公共投资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的特效药，一旦经济陷入萧条，日本政府就会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其结果是，经济出现复苏的同时，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种无节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使日本的财政危机重重，国家和地方公共债务高达700万亿日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61%。[5] 不仅财政弹性丧失殆尽，同时大量的公共投资又滋生出庞大的土木建筑业。一旦公共投资减少，就会引起大批土木建筑业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现象反复出现，与金融风潮交融在一起，成为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型转变的设想，一再削减公共投资金额，压缩财政赤字规模，强调增强民间活力和扶持民间需求，寻求经济结构中“内生”力量的强大和“自律”机制的形成。日本政府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个人消费也曾因失业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长期低迷。但是，整个经济却出现转机，如

下表所示,自2003年以来,尽管公共投资出现连续不断的下降,2003年度下降了12.10%,预计2004年将下降10.7%,2005年将下降5.01%,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却出现了3.3%、3.4%和0.7%的持续增长。从表中可见,个人消费、企业设备投资和出口已经取代公共投资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资料表明,个人消费的增长虽然缓慢但却十分稳定,2003年度实际增长1.5%,预计2004年和2005年将分别增长2.5%和1.7%,再加上住宅投资的增长更为可观。企业设备投资2003年增长幅度为12.3%,预计2004年为7.3%,2005年预计略微下降,下滑幅度为-0.2%。同期,出口增长率也分别为11.0%、11.7%和0.6%(见表1)。如果把进口增长也同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联系起来的话,不能不承认日本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过去的公共投资拉动型已经为内需推动型取代。这里所讲的内需,主要是民间需求。

表1 Needs模型经济预测

	2004年各季度经济增长率			年度经济增长率		
	1—3月	4—6月	7—9月	2003	2004	2005
实际GDP	1.6	0.4	0.5	3.3	3.4	0.7
个人消费	1.0	0.6	0.3	1.5	2.5	1.3
住房投资	0.5	0.3	0.2	0.3	1.1	-0.3
设备投资	1.7	0.0	2.2	12.3	7.3	-0.2
公共投资	-3.4	-5.1	-0.7	-12.1	-10.7	-5.0
出口	4.5	3.5	1.2	11.0	11.7	0.6
进口	3.1	2.0	1.9	4.9	8.1	0.9
名义GDP	1.1	-0.3	0.6	0.8	1.3	-0.9

注:Needs模型是日本经济新闻社综合经济指数库中的一个关于日本经济指数的预测模型。2004年7—9月及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均为预测数。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社NikkeiNet景气观察, <http://www.nikkei.co.jp>, 2004年8月21日。

2. 以“新三件神器”为代表的新制造业的雏形已经形成。“新制造业”的理念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素有财界司令部之称的日本经团联提出的一个战略设想。日本财界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痛定思痛,认为日本经济在金融等领域还处于弱势,日元升值及其后果明确表明日本在这一领域根本玩不过美国。日本要实现经济复苏,只有老老实实地在“生产制造”这一日本固有优势上下工夫。经团联当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制造业”战略,决定以信息技术武装传统产业,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优势。经过数年努力,日本在薄型液晶电视机、数码相机和DVD的生产制造和销售上取得明显优势,成为带动日本个人消费更新换代的“新三件神器”。新产品的热销给日本企业带来丰厚利润,据2004年6月3日日本财务省对23489家资本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非金融企业调查,2004年第一季度,这些企业的税前利润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4.6%。另据报道,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企业(主板上市)的1372家企业的2003年度的税前利润比上年增加28.5%。[6]

“新三件神器”的热销不仅带动了个人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且使日本的家电产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省力化转为智能化,其波及效果遍及各个产业。据统计,数码产业的生产规模2003年为7万亿日元,同年带动相关设备投资金额为1万亿日元。预计2005年数码家电业生产规模将达9.3万亿日元,2010年将达18万亿日元。为此,许多日本媒体把这一项经济复苏称为“数码景气”。日本统治阶层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日本经济的强势在于:高端的国内市场、优质的劳动力、与产品开发相结合的研究开发和广泛的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能力5个方面,今后应以此为基础重建以强大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世界经济大国。[7]2004年6月由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联署发表的《平成15年度制造业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新制造业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已使制造业以“守势”转入“攻势”。日本制造业过去靠从美欧进口技术,通过大规模生产来削减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则是靠本国的研究开发,形成研究开发—新产品问世—创造民间新需求—扩大企业收益这种经济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新模式。[8]如果说从公共投资拉动型转为民间需求推动型是宏观上的日本经济新结构性特征,那么,大量生产成本节约型向研究开发需求创业型的转变则是微观上的日本经济结构性新变化。

### 3. 循环型经济的出现。

所谓循环型经济,是指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生产模式。与生产—消费—废弃传统模式不同的是,循环经济是以生产—使用—回收—再生利用为特征的。日本早在2000年6月就出台了《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该法明确提出企业有责任使其产品成为使用后可再生的循环资源,有义务将循环资源进行处理加工和再利用。其后,日本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法律和法规,如《家电回收再利用法》、《汽车循环法》和《建设循环法》等。其中,2001年4月颁布的《家电回收再利用法》明确规定生产厂商有义务对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和电冰箱等进行回收和再利用,消费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运输和回收费用,各地方政府有责任对回收利用过程进行监督。该法颁布的当年,松下公司即斥资18亿日元建立了家电解体工厂,对旧家电进行回收利用。该厂开工的第一年就回收了50万台旧家电。以重量计,旧家电的80%都得到回收利用,回收再利用的铜、铁、铝等原材料达10万吨以上。[9]2004年夏天富士施乐公司成功研制了一种新型合成树脂材料,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家电和器械绝大部分可以回收再利用,几乎可达“零废弃”。

循环经济的另一显著进展是新能源开发。2003年4月日本岩手县第一牛粪发电厂开始运转。东京都正在建造生鲜垃圾发电厂,回收饮食店的残羹剩饭和卖不出去的盒饭与食品用来发电,预计2005年该厂能建成投产。日本的太阳能发电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研制成功了新型太阳能电池。现一般安装在房顶上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光转化为电的变换效率为14%左右,新研制成功的新型太阳能电池的变换效率达28.5%。因其轻巧,可安装在小至手机大至汽车上。[10]预计2030年日本对石油依赖程度将由现在的50%降到40%,新能源所占比例将上升为20%。

## 二 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保证

日本经济曾于1994年和1996年两次出现复苏的迹象，然而这两次复苏均未能持续，刚有起色旋即剧烈下降。这种起而又落的反复，不能不使人们对当前的经济复苏能否持久而心生疑惑。但是，如果对这次经济复苏进行深入考察，就有理由判断这次经济复苏有着许多结构性的保障，是难以逆转的。大体上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结构性保证。

### 1. 创新成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旋律。

这首先在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力度上体现出来。尽管日本经济受“泡沫经济”的重创，但是企业从未放松过研究开发的战略投入。近年来在新制造业战略的指引下，不断增大投入力度。2000年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日本为3.12%，美国为2.65%，德国为2.37%，英国为1.87%。[11] 据《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企业研究开发调查报告，自2000年以来日本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经费连续三年增长。调查表明，有75%的企业准备大幅度增加研发经费，55%的企业计划在今后五年中每年提高研发经费比例。[12] 在研发经费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合作开发正成为日本企业研发的新特征。相对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无力单独进行重大技术攻关，为此，日本政府于1998年公布了TLO法即《大学等研究机构技术转移法》，以减免税收、提供补贴等方法鼓励中小企业同国立科研机构、大学合作开展研究。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发表的《平成15年度日本技术革新中的产学合作实态调查》称，日本企业的70%都在以各种形式同国立科研机构、大学开展联合开发。合作开发的重点大都集中在医药、电子电器和建设行业。[13]

持续和大量的科研投入，使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新的动力和物质支持。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的日本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制造业已经由成本节约型向创造领先型转变。前者是以使用从欧美引进新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后者则是通过研究开发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日本企业已经出现了五个新兴产业群。它们是：（1）第三性产业。所谓第三性产业是指处于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之间的产业，具体来说是以数码技术和网络技术武装起来的家电、系统化的机器人，ITS信息服务的汽车等，其中信息化家电的市场规模在2025年可从现在的5万亿日元上升到28万亿日元。（2）尖端产业。近年来以国家投入为主体而形成的尖端科学已在海洋、航空、太空等领域形成产业规模，主要有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新型超音速飞机和人造卫星等。日本政府期望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波及效果，预料尖端产业到2025年也会达15万亿日元的规模。（3）老龄化产业。由于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人的家庭护理、疾病预防、家庭病床、安全管理与康复、基因诊治等产业规模如今已达39万亿日元，2025年将达到155万亿日元。

（4）环境产业。目前以环境监测、环境整治、防止灾害、循环利用为主体的市场规模为15万亿日元，2025年将达60万亿日元。（5）感性产业，即新型文化娱乐产业。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消费的重心正在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使人的感官得以满足的电子游戏、动画、电影、音乐、时装、家具以及运动和观光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群，市场规模现已达31万亿日元。2025年将达23万亿日元。日本经济产业省认为，这五大产业群将是今后日本活力之所在。[14]

### 2. 竞争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调。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被相当多的西方媒体讥讽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认为日本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其政府行为、企业组织、市场结构均离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相当距离。日本财界对泡沫经济的反思由此而从经济产业深入到社会体制层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决策层发起了一连串的体制改革，力图把竞争机制融入到社会经济各领域、各层面上去。

首先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从桥本龙太郎到小泉纯一郎无不高举行政改革的大旗，效仿里根、撒切尔夫人在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强调民间活力，减少政府干预，中央政府机构从22个省、厅减少到现在的1府12个省、厅，包括邮政在内的一大批政府主办的企事业单位被民营化。

其次是战后延续了几十年的“企业系列”被彻底打破。原来各自成系统的三菱、三井、住友、芙蓉、安田等企业集团在严峻的经营危机冲击下被迫相互兼并。仅在1999年8—10月的三个月内就出现多起跨集团的兼并和改组。8月20日第一劝业银行与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合并；10月7日东海银行与朝日银行合并；10月9日DDI、ICDD和IDD合并；同日，日石三菱与科斯莫石油合并；10月14日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10月16日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和住友海上火灾保险等合并。在短短两三年内，日本银行业从1990年前的22家银行兼并改组为4家。直到现在，这种跨集团的兼并仍在震荡着日本。2004年7月东京三菱银行要与原富士银行等合并而成的日联银行（UFJ）合并，由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而成的三井住友银行又横插一杠，也提出有意收购日联银行。旧财团的企业合并，彻底打破了战后日本几十年形成的企业格局，相互持股、相互照顾的局面不复存在，昨日之友成为今日之敌，从而激化了企业之间的竞争。

第三，在企业内部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已趋瓦解。2001年松下电气公司出现首次亏损后，立即裁减1.3万名员工，同时将上至公司董事下至课长的全体经营管理者的月薪降低了15%。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松下一向被公认为是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的始作俑者。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经发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松下决不解雇一名员工。

### 3. 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结构已现雏形。

众所周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是战后日本政治的鲜明特征，这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上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日本政治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在野党几经分化，已经形成了以民主党为主体的强大阵营。民主党虽然在政策和执政能力上有许多弱点，但其事实上已经成为能与自民党对阵、随时可以上台执政的竞争对手。在2004年7月12日揭晓的第20届参议院选举改选的121个议席中，自民党获得49席，民主党获50席，公明党获11席，共产党获4席，社民党获2席，无党派获5席。民主党刷新了1989年参院选举以来在野党所获议席的记录。当时风头最盛的社民党

也只获46席。[15] 民主党不仅在议席上逐渐逼近自民党，而且早就建立了“影子内阁”，为其将来上台做好了组织上和政策上的准备。民主党的崛起，意味着日本政坛经过十多年的分化组合，已经初步形成了保守两党轮流执政的态势。有理由认为，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具备了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平稳交接政治权力的功能。各大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选择自己满意的政党上台执政，来体现自己的意志，寻求自己的利益。与自民党一党专政时的密室政治相比，这无疑是个进步，至少可以避免因自民党内各派阀的权力之争而打乱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财界对政治结构的这一新变化的反应是十分灵敏的。2004年1月28日，日本经团联发表了《2004年第一次政策评估报告书》，该报告对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政策水平与执政能力做了系统的公开评价。整个政策评估由三部分组成，即

(1) 总体评价；(2) 依照政策优先事项的评价；(3) 综合事项评价。其核心部分是第二项，即各政党政策与财界关心事项的对照。在这一部分中，经团联明确地列出了十项要政党优先考虑和实施的事项。其中主要有：(1) 为经济再生和强化国际竞争力的税制改革；(2) 消除将来不稳定因素的社会保障改革；(3) 为引入民间活动而进行的行政改革；(4) 为实现科技立国的环境整治；(5) 确立能源战略和促进产业界自身努力的环境政策等。经团联按自民、民主两党政策主张与上述十项优先课题之间的一致性及两大政党为实施这些政策所做的具体努力分别打分，分数由A至E分为五个等级，A为积极推进，E为消极后退。令人深思的是财界给两党打出的分大体相当，自民党略占上风。在各党政策与财界优先事项的一致性上，自民党得了两个A、八个B，民主党得了五个B、三个C、两个D。在各政党为政策实施所做努力上，自民党得了两个A、八个B、一个C，民主党得了三个B、五个C、两个D。给自民党的总体评语是：尽管缺乏具体实施细则，但其政策与财界的关心事项基本一致。给民主党的评语则是：其行政政策、住宅政策等与财界关心事项基本一致，但是环境政策和雇佣政策上与财界有所差异。同时，又表示希望民主党为从单纯的批判政党转变为能上台执政的有独自政策取向的政党而努力。[16] 经团联表示今后每年都要发布这种政策评估，并强调这是企业向政党支付政治献金的依据。

### 三 日趋活跃的东亚战略

经济力量是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要素。已经有许多分析表明，当今美国的单边主义固然同冷战结束有关，但其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里根政权为重建美国经济而做出的艰辛努力之中。日本在其经济鼎盛的80年代后期曾喊出“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的豪言壮语。然而在泡沫经济的打击之下，日本的对外战略姿态一落千丈。在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日本曾强打精神弄了个至今看来仍有不少积极意义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但因底气不足而旋即销声匿迹。如今，日本经济复苏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其对外战略姿态，特别是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劲头也随之上升。

1. 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为日本在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国际政治的范畴中，公共产品是指一个霸权国家为维系以其为主导的体系，向体系内成员国提供的用以满足共同需求的物品。一般来说，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的金融结构和可靠的安全保证，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国际公共产品的象征。就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来说，主要粘合剂是贸易和投资。谁能提供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充裕的资金，谁就能成为合作的纽带和主导。日本要想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必须在这两方面有所贡献。由于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模式是外需依存型，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以上依赖于出口。尽管其为了争取廉价劳动力而大量投资东盟国家和中国，但是总体上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商品的出口者，而非商品的吸纳者。从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角度而言，只要日本无法为有关各方提供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其就难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有实质性的大动作。

根据上文分析，此次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内民间需求，第三性产业、尖端产业、环境产业、老龄化产业和感性产业等新兴的五大产业群又是以新产品的开发、新需求的创造为其共同特征的。因此，一方面因新产品开发的乘数效应会引起国内需求爆发性增长，另一方面又因新需求的出现使国内消费更加有层次化。以此为背景，日本国内市场在其容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对外国商品的吸收能力也会有所上升。特别是消费的多层次化，将十分有利于经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于日本的东南亚各国商品的进入。如果前述日本经济复苏的新趋势能够进一步深化，那么，一向紧闭大门的日本国内市场对亚洲国家的开放度就会逐年提高。再加上日本以直接投资为主体的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有望得到加强，日本政府的东亚战略将会更趋活跃。

2. 在东亚地区的国际机制运作空间增大。所谓国际机制，是有关国家影响政治经济的相关依存关系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协议和条约，也可以是默契和共识。目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可称得上国际机制的除了APEC以外，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10 + 3”，即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二是三个“10 + 1”，即中、日、韩三国分别同东盟十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协议谈判；三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上述四种东亚地区的国际机制，日本的态度冷热是大不一样的。决定态度冷热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从中获利期望值的大小。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分析，由于经济的跨国境发展，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利润源泉”和“雇用源泉”。为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保证，通过条约、协议和其他形式来保证日本企业的利益。经团联在2004年3月16日发表的《关于强化经济合作的紧急建议》中，明确要求政府在东亚地区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该报告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日本企业就会处于不利地位。2003年版的《通商白皮书》中引用的东南亚企业战略研究会资料说，按WTO于1992年设立的全球贸易分析工作小组开发的衡量各国贸易政策的一般均衡模型计算，如果日本与东盟十国建成自由贸易区的话，日本的GDP规模将会每年增加1.1万亿日元到2万亿日元，并能创造出15万—26万个就业机会。[17] 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空前热情。2002年1月同新加坡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并提出同东盟十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的设想。2003年10月，小泉首相在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决定自2004年起开始同其他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于2012年底大体完成。目前，日本同东盟十国的谈判大都已经开始，有的进展十分迅速。

#### 3.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空前凸现。

无可讳言，在“10 + 3”、三个“10 + 1”和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明显落后。日本外务省发表的《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论及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优先顺序时，使用了“应该首先追求同韩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然后，以此为基础中长期地筹组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邻国（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18] 这一措辞微妙令人深思的说法，在舆论上，无论日本的报刊还是中国的媒体近来都有“经热政冷”的说法，这虽然不确切，却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一方面贸易和投资猛增，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300亿美元，估计2004年要超过1600亿美元，另一方面因小泉坚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中日两国首脑已有近四年未举行双边会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是东亚地区两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应该看到这两股潮流的趋势及其影响。撇开历史上的正义和罪恶来奢谈中日关系的“新思维”是不可取的。但是探索如何通过经济合作来寻求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未来则是任何有责任感的人们所义不容辞的。确如有的学者发表文章所分析的那样，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使中日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由中国单方面依靠日本演变成了中日双方互有需求的相互交流。这正是中日关系的进步，这恰恰证明中日关系更加重要，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更加广阔了。按照国际关系理论所确定的相互依存的定义，双方交流到了一定程度时，到了双方为彼此付出代价，即到了一国的政策变更不得不考虑对方反应的程度时，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新形势下，通过推进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寻求合作共赢，是一篇尚未开笔的大文章。

（责任编辑：张义素）

- 
- [1] 『日本経済新聞』2004年8月18日。
- [2] 『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04年8月12日。
- [3] 《国际金融报》2004年8月13日。
- [4] 路透社东京分社2004年8月22日电讯。
- [5] 丸野内三『日本国債は安全?』、日本戦略研究会、2002年11月，<http://www.geocities.jp>。
- [6] 《日本企业整体复苏》，《国际金融报》2004年6月4日。
- [7] 通商産業省『21世紀における経済と産業の課題と見通し』、2001年3月。
- [8] 経済産業省『2003年版製造基盤白書（ものづくり白書）』、2004年6月。
- [9] 苏海河：《日本旧家电都派了什么用场》，《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29日。
- [10] 《环球》2004年第15期。苏海河：《日本旧家电都派了什么用场》，《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29日。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网站文章，王志乐：《日本促进产业竞争力策略分析》。
- [12] 曹鹏然：《日本——研发为经济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04年8月20日第七版。
- [13] 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所『平成15年度技術革新の中の産学連携実態調査』。
- [14] 通商産業省『21世紀における経済と産業の課題と見通し』、2001年3月。
- [15] 新华社东京2004年7月12日报道。
- [16] 日本経団連『2004年第1次政策評価の発表にあたって』、2004年1月28日，<http://www.lceidunren.or.jp>。
- [17]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03年版、2003年7月。
- [18] 外務省『日本のFTA戦略』、2002年10月。